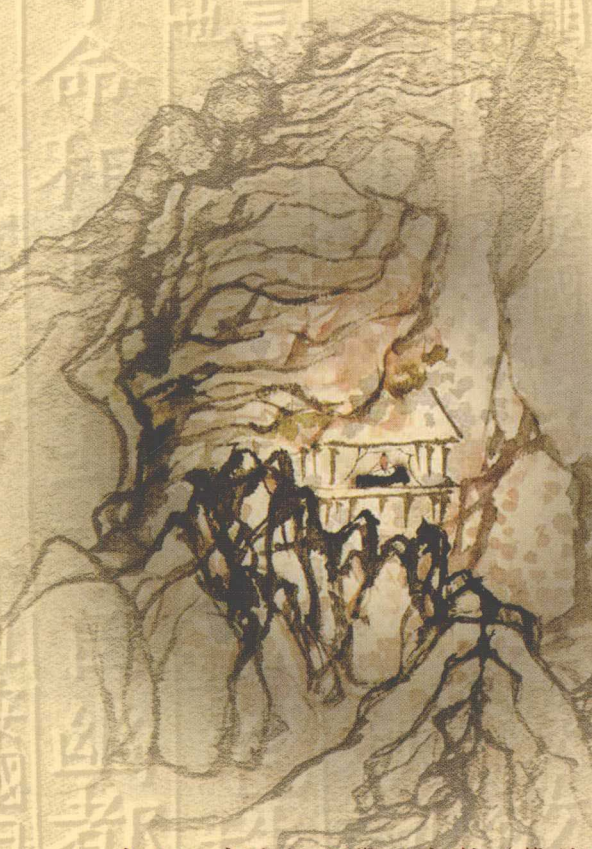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古今通塞：漢語的 歷史與發展

何大安 主編

語言組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古今通塞：
漢語的歷史與發展

何大安 主編

語言組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古今通塞：漢語的歷史與發展 / 何大安主編。
—— 臺北市：中研院語言所籌備處，民 92
面；公分——（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
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組）

ISBN 957-671-975-5 (精裝)。—— ISBN 957-
671-976-3 (平裝)

1. 中國語言 — 論文, 講詞等

802.07

92004464

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組
古今通塞：漢語的歷史與發展

主 編：何大安

出 版 者：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發 行 者：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30 號

印 刷 者：文匯印刷資訊處理有限公司
臺北市環河南路二段 211 號

展 售 處：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T: 886-2-2786-3300 F: 886-2-2785-6622
<http://www.ling.sinica.edu.tw>

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38 號 10 樓之 1
T: 886-2-2321-9033 F: 886-2-2356-8068
Email: Lexis@ms6.hinet.net

四分溪書坊

臺北市南港區中央研究院活動中心地下室
T: 886-2-2783-9605 F: 886-2-2783-9620
Email: kk1133@saturn.seed.net.tw

定 價：平裝 新臺幣 200 元
精裝 新臺幣 250 元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出版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總 序

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於公元二〇〇〇年六月廿九日在臺北南港院區學術活動中心揭幕，會期前後三天至七月一日閉幕。這一次漢學會議的舉行距離於一九八六年召開的上屆大會已有十四年之久，而與第一屆大會的舉行則已相隔廿年的時間。在這樣一段長久的時間內，國內外漢學界已有相當的成長與變化，正如本院李遠哲院長在開幕致詞中所說的：「在多元觀點、多元材料與利用新科技工具的研究趨向下，近年來國際漢學研究的視野更趨於寬廣，出現許多新主題、新理論與跨學科的研究成果。」因此本院「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乃結合人文學科各研究所，經兩年時間的籌備而召開本屆大會，其目的即是希望藉這一擴大的學術聚會，讓國內外漢學界研究同仁再有一次廣泛討論及交換意見的機會，以便共同探討籌劃「漢學研究在廿一世紀的新方向」。

第一、二兩屆國際漢學會議是由本院的三個人文學科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與民族學研究所共同參與舉辦。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參加籌備的單位除去上述三個研究所之外，又增加了中國文哲研究所與語言學研究所，而在「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的委員中亦邀請多位國內大學相關學門的教授參與。在會議內容的分組上也有變動，第一屆會議共分為六組，第二屆會議則改為五組，本次會議則增加為歷史、文學、思想、文字學、語言學、族群關係（人類學組一）、信仰與生活（人類學組二）等七組之外，並有「漢籍數位典藏研討會」合併在會議中舉行，以展示本院推動現代資訊科技在漢籍典藏與搜集上的應用成果。在會議節目程序的安排上，本屆會議也略有創新，除去有兩次大會特別演講外，並有十四次「主題演講」以配合各組之下再分出的研討主題，分別邀請與主題相關的資深學者作演講，以突出並導引各研討主題的意義與研討。最後

各組並各有一場綜合討論，以整合各領域研討的意見。

本屆大會共有國內外漢學研究者三百餘人與會，提出論文二百一十一篇。前兩屆漢學會議均將會議論文分組編印成冊出版。本屆會議各主題下之論文都具相當專業性與系統性，籌備會與各組主持人均希望早日刊出。茲為編輯會議論文出版事務，特由「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邀請其副秘書長，現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黃寬重教授及執行秘書、史語所副所長王明珂教授，分別擔任召集人與副召集人，與各所代表何大安、何翠萍、黃克武、李豐楙、邱澎生等教授共同組成編輯小組主持編輯出版事務。邱澎生兼任此編輯小組秘書，與助理李雅玲小姐共同襄理協調聯繫事宜。各分冊之主編則由劉翠溶、石守謙、邢義田、劉增貴、臧振華、陳國棟、黃克武、鍾柏生、何大安、何翠萍、蔣斌、林美容、李豐楙、劉述先等教授分別擔任。本屆大會論文集在經費困難與出版形式之議定極費精神的情況下得以陸續出版問世，都是編輯小組同仁與各分冊主編共同努力的成果，在此本人特代表「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向他們表示至深謝忱。

本屆國際漢學會議得以順利召開與完滿達成，首先要感謝本院李遠哲院長與楊前副院長國樞的大力支持與鼓勵，同仁們均十分感激。「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的委員，包括石守謙、李壬癸、呂芳上、徐正光、張玉法、黃俊傑、黃啓方、黃應貴、劉述先、劉翠溶、鍾彩鈞、戴璉璋、龔煌城諸教授，在籌備期間極備辛勞，而大會秘書處在黃寬重與王明珂兩位教授的領導下，在開會期間更是日夜不休地工作，更是令人欽佩，本人與大會籌備會副主席杜正勝院士謹代表「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及與會漢學界同仁也向他們敬謹表示衷心感謝之意。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籌備會主席

李亦園 謹誌

2001. 12

編者序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語言學組的共同主題是「漢語的發展」。現在將當時發表的論文、評論、專題演講再經審查、選擇、修訂，其中關於方言發展的九篇合爲一集，關於音韻和語法發展的九篇合爲另一集，分冊出版。借《切韻·序》「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話，分別定名爲《南北是非》與《古今通塞》。

語言學組會議的規劃，是由當時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主任李壬癸先生主持。他考慮到整個會議的空間有限，會議主題必須集中才能有比較好的發揮；同時又爲了能在共同的主題之下讓最多的人參與討論，所以把主題訂爲「漢語的發展」。其中一半的時間研討方言，另一半的時間研討音韻和語法。當然，這只是粗略的區分；兩部分之間相互呼應之處所在多有。因此雖然分作兩集，卻無疑是「合則雙美」。希望讀者參照閱讀，庶幾能得會議整體的大要。

收在這兩集裡的論文，篇篇都是力作。替這些論文作分篇導讀是不智的，因爲我要學習的比我所能體會的要多得多。大體來說，無論研究的具體對象是甚麼，「發展」這個主軸始終貫串所有的篇章。在閱讀完兩冊的修訂稿之後，我個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它們可以當成漢語史和方言史的選集來看。讀者如果進入作者所鋪設的網絡，每篇文章都可以生發出成系列的論述。十八個交錯的連環，連環成一整套的漢語史。遠的不必說，即使拿來與第一屆、第二屆相比，這種系統的相關性、以及方法與角度的多元呼應，確實呈現了相當大的變化。從豐富知識的觀點來看，這種變化代表了一種積極的進展；也代表了漢學研究之中，語言學這一領域的精神與氣象。我隱隱的感覺到，這兩冊選集的背後，除了作爲主題的「發展」之外，還有一些共同的東西。這些東西是可以寫進語言學史的。希望讀者的慧眼能夠看得出來。

《南北是非》與《古今通塞》在會議之後兩年才完成編輯，主要是因為修訂、審稿、再修訂和編輯的過程相當冗長。現在終於可以出版，我除了感謝中央研究院「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的支持之外，也要感謝李壬癸先生對整個語言學組會議的規劃，以及會議秘書陳玉冠小姐和執行編輯郭君瑜小姐在集稿、編輯、校對上的辛勞。尤其要感謝的是作者和參與討論的女士先生們；若不是他們的貢獻，我們不可能有聞道日新的機會。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語言組論文集主編
何大安 謹誌
2002. 12. 09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各分冊書名表

- 人類學組 何翠萍、蔣斌主編《國家、市場與脈絡化的族群》
林美容主編《信仰、儀式與社會》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出版）
- 文字學組 鍾柏生主編《古文字與商周文明》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
- 文學組 李豐楙主編《文學、文化與世變》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出版）
- 思想組 劉述先主編《中國思潮與外來文化》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出版）
- 語言組 何大安主編《古今通塞：漢語的歷史與發展》
何大安主編《南北是非：漢語方言的差異與變化》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出版）
- 歷史組 邢義田主編《中世紀以前的地域文化、宗教與藝術》
陳國棟主編《漢文化與周邊民族》
臧振華主編《史前與古典文明》
劉翠溶、石守謙主編《經濟史、都市文化與物質文化》
劉增貴主編《法制與禮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
- 黃克武主編《性別與醫療》
黃克武主編《思想、政權與社會力量》
黃克武主編《軍事組織與戰爭》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目 錄

總序.....	李亦園	i
編者序.....	何大安	iii

主題演講與評論

漢語音韻史上有待解決的問題.....	丁邦新	1
迎接一個考證學和語言學結合的 漢語語法史研究新局面.....	梅 廣	23

論文

古漢語虛詞研究評議.....	郭錫良	49
上古漢語到中古漢語語法的重要發展.....	魏培泉	75
古漢語實詞的複合化.....	劉承慧	107
On Moving Constituents i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lain Peyraube	141
欲賞知音 非廣文路—— 《切韻》性質的新認識.....	尉遲治平	157
從原始漢藏語到上古漢語 以及原始藏緬語的韻母演變.....	龔煌城	187
What Are Cognates and What Are Variants in Chinese Word Families?.....	Axel Schuessler	225

漢語音韻史上有待解決的問題

丁邦新
香港科技大學

漢語音韻史的研究有兩條主線：一條是繼承傳統語文學的研究，把古文獻中有關漢語語音的資料整理分析，用現代語言學的眼光加以詮釋，賦予新的意義。另一條是調查漢語方言，整理方言的語音系統，用歷史語言學的方法擬測古音。研究者試著把這兩條線交匯起來，找出音韻史上若干演變的點。到目前為止，第一條主線的成績相當可觀，第二條主線的研究還有待加強。至於追尋兩條線的交匯點，則有的成功，有的難以成立，還有很長遠的路要走。

1. 漢語音韻史研究方法論

1995 年同時有兩篇文章討論到漢語音韻史研究的方法論。一篇是 Jerry Norman (羅杰瑞) 和 South Coblin (柯蔚南) (1995) 合作的文章：A New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一篇是我寫的〈重建漢語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丁 1995)。這兩篇文章都認為現在大家所採取的研究法有些缺陷，應該改弦更張，但是意見並不相同。我想有必要在此略為介紹這兩篇文章的大意。

Norman 和 Coblin 兩位提出以下四點：一、《切韻》並不代表任何時代任何地點的一個活方言，根據《切韻》所擬的中古音因此不是一個語言，既無音韻結構，亦無詞匯文法可言。二、毫無根據說《韻鏡》代表唐代的長安話。三、唐代的長安話未必是一個舉國奉行的官

話 (koine)，尤其不能說這種長安話漸漸取代了唐以前的多種方言。四、不能說閩語以外的各種方言都從《切韻》來，因為《切韻》不是一個真實的語言，而是傳統音韻注釋的記錄。結論是我們需要從一個新的角度出發，試從方言的比較做起，必須結合傳統的比較方法和歷史文獻來研究，在兩者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所謂方言的比較應離開「字」的比較，從詞匯著手，並注意文法，因此需要一個方言的分類。根據分類才能了解各大方言區的內涵，然後再在同一個大方言區裡做次方言的比較，從而釐清漢語的歷史演變。

我 (1995) 的文章基本上也說《切韻》不是一個活方言，不能擬測為一個單一的音系，而是南北兩個方言的融合，一個是北方的鄴下音系，一個是南方的金陵音系。《切韻》序中記錄參與討論的九個人可以彼此溝通，主要討論的是字與字可不可以押韻的關係，其次才是聲類的問題。但可以押韻並不代表讀音相同，所以我們沒有理由給《切韻》擬測單一的音系。而傳統的音注最早的到東漢，他們討論的讀書音涵蓋東漢到晉，西漢及以前根本沒有資料，無從談起。我認為現代方言除閩語白話音外應分兩組，一組從鄴下音系演變而來，另一組從金陵音系演變而來。

回頭來看這兩篇文章，主要的不同點有二：第一、我認為《切韻》可以分別擬測南北兩大方言音系，Norman 和 Coblin 兩位沒有這個看法。第二、他們覺得研究應從方言詞匯比較著手，而我根本沒有提起。現在來檢討一下。

我以為《切韻》既是為押韻而作的韻書，自然離不開字音，不提詞匯文法毋寧是自然的事。如果它的音系是由兩個大方言拼湊而成，加上五家韻書韻類的區別，我們可以設法還原。首先把不大常見的讀書才用得上的字放在一邊，然後把南北有差異的地方分開，再根據現代方言加上《切韻》的區別擬測南北兩個方言的音系。近年來梅祖麟 (1995, 1999) 文章中屢屢提到的古江南方言、江東方言就是我所說的

《切韻》的金陵音系。

根據《切韻》及方言擬測當時的兩個音系固然是讀書音，但當時的讀書音與白話音相信距離還不是太遠。《切韻》成書後八年，隋煬帝 609 年才開始設置明經、進士兩科，大量的文白之異是科舉盛行以後讀書音跟方言不相合才產生的現象。所以到現在方言之中以閩語的文白距離最大，官話系統文白的差異非常有限。《切韻》序中提到的九個人既然可以討論押韻問題，而從顏之推的〈音辭篇〉看來，幾乎沒有提到文白之異，可見當時說話讀書是很相近的，可能跟大多數的官話方言類似。鄴下和金陵兩個音系如果擬測完成，代表的應是當時實際的口語。

Norman 和 Coblin 兩位認為方言研究應該從詞匯的比較著手，我以為如果沒有《切韻》，如果文白讀音差異極大，那當然要從詞匯的比較開始。現在既然可以從《切韻》的間架和方言的字音擬測當時的兩大音系，而且文白的區別又不是那麼顯著，那麼，從字音入手和從詞匯入手得到的結果相信不會有很大的差別。反而，從詞匯入手的方法會有一點局限和偏差。以下分從三方面來說：

第一、詞匯和字音沒有差別

我們用今天的方言來說明這個現象，資料的來源是北大的《漢語方言詞匯》和《漢語方音字匯》。用數目字 1357 表示陰調，2468 表示陽調，0 表示輕聲。有些不分陰陽調的方言只用 135 表示平上去，如太原。

方言點	詞目：桃花 (1995:88)	字目：桃 花 (1989:179, 15)
北京	t'au2 xuar1	t'au2 xua1 (花兒 xuar1)
濟南	t'ɔ2 (42→45) xua0	t'ɔ2 xua1
西安	t'au2 xua1	t'au2 xua1
太原	t'au1 xua1	t'au1 xua1
武漢	t'au2 (213→21) xua1	t'au2 xua1
成都	t'au2 xua1	t'au2 xua1
合肥	t'ɔ2 xua1 (212→21)	t'ɔ2 xua1
揚州	t'ɔ2 xua1	t'ɔ2 xua1
蘇州	dæ2 (24→22) ho0	dæ2 ho1
溫州	dɜ2 (31→21) ho1 (44→33)	dɜ2 ho1
長沙	tau2 fa1	tau2 fa1
雙峰	dy2 xo1	dy2 xo1
南昌	t'au2 fa1	t'au2 fa1
梅縣	t'au2 fa1	t'au2 fa1
廣州	t'ou2 fa1 (53→55)	t'ou2 fa1
陽江	t'ou2 fa1	t'ou2 fa1
廈門	t'o2 (24→33) hue1	t'o2 hue1
潮州	t'o2 (55→213) hue1	t'o2 hue1
福州	t'ɔ2 (52→44) ua1 (x-)	t'ɔ2 xua1
建甌	t'au5 xua1	t'au5 xua1

除去變調以外，詞目的「桃花」就等於字目的「桃」加「花」，二十二個方言點無一例外。方言的擬測對變調的利用（丁 1982, 1984；何 1984），這裡可以暫時不談。個別詞匯等於相關字音的總和，從字音入手和從詞匯入手在某些情形下得到的結果是一樣的，所以說沒有差別。

第二、從詞匯入手的局限

從詞匯入手的比較研究有時可能只能作大方言之中次方言或小方言的比較，無法拿來比較大方言，當然不容易談到擬測古音。因為詞匯之間的差別太大了，難以找到可以比較的共同詞匯。再以現代方言為例，請看以下的例子。

方言點	詞目 ¹ ：	螳螂	t'an ₂ lan ₂
北京		刀螂	tau ₁ lan ₀
濟南		刀螂	tɔ ₁ lan ₀
西安		猴子	xou ₂ tsɿ ₀
太原		扁担婆	pie ₃ tæ ₅ p'ɣ ₁ , pæ ₃ tæ ₅ p'ɣ ₁
武漢		休子	ɕiou ₁ tsɿ ₀
成都		孫猴子	sən ₁ xəu ₂ tsɿ ₀
合肥		刀螂	tə ₁ lā ₀
揚州		刀螂子	tɔ ₁ lan ₀ tse ₀
蘇州		螳螂	dəŋ ₂ ləŋ ₂
溫州		剪裾娘	tɕi ₃ tɕy ₁ ŋi ₂ , tɕi ₃ tɕ'iəu ₁ ŋi ₂
長沙		禾老蟲	o ₂ lau ₃ tsən ₂
雙峰		禾老蟲	əu ₂ lɤ ₃ dan ₂
南昌		螳螂	t'əŋ ₂ ləŋ ₃
梅縣		螳螂□	t'əŋ ₂ ləŋ ₂ ɛ ₃
廣州		馬狂螂	ma ₄ k'əŋ ₂ ləŋ ₂
陽江		馬騮狂	ma ₃ ləu ₂ k'əŋ ₂
廈門		草猴	ts'au ₃ kau ₂

¹ 因為跟主要的討論不相干，資料裡省略了變調。

潮州	草猴	ts'au3	kau2
福州	草蜢哥	ts'au3	maŋ3 kɔ1
建甌	蘆螞	su5	ma3

我們可以看到方言大體的區分，大概官話區的是「刀螂」，吳、贛、客家是「螳螂」，湘語是「禾老蟲」，閩南、潮州是「草猴」。其他詞匯的情形更是各式各樣，頂多在一個大方言區裡作比較，給次方言分類，研究彼此的親疏關係。顯然不可能藉詞匯的比較作古音的擬測。

第三、從詞匯入手可能產生的偏差

如果只看詞匯，不參考《切韻》的字音，有時可能產生偏差。例如：

方言點	詞目：	痣	
北京	痞子	u5	tsɿ0
濟南	痞子	u5	tsɿ1
西安	蠟子	iæ3	tsɿ0
太原	黑蠟	xəʔ7	ie3 紅蠟 xun1 ie3
武漢	痣	tsɿ5	
成都	痣	tsɿ5	
合肥	痣	tɕɿ5	
揚州	痣	tsɿ5	
蘇州	痣	ts'ɿ5	
溫州	痣	tsɿ5	
長沙	痣	tsɿ5	

雙峰	痣	tsɿ5
南昌	痣	tsɿ5
梅縣	痣	tsɿ5
廣州	痣	tʃi5
陽江	痣	tʃi5
廈門	痣	ki5
潮州	痣	ki5
福州	痣	tsei5
建甌	痣	tsi5

「痣」在廈門、潮州讀「ki5」，如果只看這個資料，可能會懷疑「痣」為何有這個讀法？會不會就是「胎記」的「記」？但是如果知道《切韻》照三系聲母的字在閩南有一類讀舌根聲母，如廈門：枝 ki1、齒 k'i3、柿 k'i6，那麼就不會產生懷疑。

總之，對傳統字音的重視有它的道理，即使純從詞匯入手，一方面可能跟字音的研究並無二致，另一方面可能有它的局限，並發生不必要的偏差。因此，我認為傳統字音和方言詞匯的研究可以並行不悖，不能完全揚棄《切韻》的功用。換句話說，不能完全離開「字」的比較。²

² 從另一方面來說，詞匯研究也是不可缺少的。梅祖麟兄指出：「(1) 蘇州話「豬」一般說 tsɿ，如「豬、豬肝、豬肉、公豬」，只有「豬油」的「豬」說 tsɿ。(2) 上海話「虛心、虛實」，虛字單說都說 xy，只有 he tsong「虛腫」一詞中的「虛」字說 he，（拙著〈方言本字研究的兩種方法〉）。」可見詞匯的研究要結合字音，一個字不同的讀法可能顯示方言的層次。以上梅兄的話引自他給我的通信，在此致謝。

2. 中古三等韻的來源

《切韻》中的三等韻特別多，佔全部韻數的 49%。對這個現象有許多解釋，早年 Pulleyblank (1962) 認為三等韻是從長元音來的；後來 (1973) 大體認為一二四等韻和三等韻來自不同的音節，三等韻是從有降調重音的音節來的。Bodman (1980) 認為有兩種 -j-，一早一晚。鄭張尚芳 (1987) 和 Pulleyblank 相反，認為是從短元音來的，Starostin (1989) 也有相同的意見。Norman (1994) 則將上古漢語的音節分為三種，認為三等韻是最自然的普通音節顎化的結果。只有柯蔚南 (Coblin 1986) 和龔煌城 (1995) 認為三等韻的 -j- 是原始漢藏語就有的，龔煌城的最主要的證據就是西夏語顯然保存了原始漢藏語的介音 -j-。對於西夏語的證據別人不研究的難以置喙，所以，我想從漢語本身的材料，檢看一下這幾個說法哪一個更接近事實。

設想上古若有長短元音的區別，這在音韻層次是一個很基本的差異，那麼在《詩經》押韻裡多少應該透露一點消息。如果有不同的音節，可不可以一起押韻呢？我想檢看一下《詩經》的韻例，看看三等韻字在押韻的行為上有沒有特殊的地方。如果三等韻字自成一類，和一二四等字不同，那麼有可能是從某一類音演變而來的，或為長音或為短音，反正與一二四等字是不同的兩類音，或者是不同的音節；如果三等字總跟一二四等字混在一起押韻，那麼就沒有理由相信有長短音的區別，可能也沒有兩種音高不同的音節，反而可以推論三等韻有某種介音，它跟一二四等字押韻是因為主要元音相同。

《詩經》的韻例因研究者的不同而有認定的差異，但是用整體的韻字來統計，幾處個別性的差異就無關宏旨了。現在根據陸志章 (1948) 的《詩韻譜》，參照王力 (1980) 的《詩經韻讀》加以統計，以下便是統計的結果。